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及其对心理学家的启示[1]

黄梓航[1] 王俊秀[2] 苏展[3,4] 敬一鸣[3,4] 蔡华俭[3,4]

（[1] 成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成都 610106）（[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4]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49）

摘要 社会心理学有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取向。虽然多数时候相对独立发展，但两者都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进行了相当的研究。社会学家从社会或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的变化两个方面对社会转型进行了大量研究，前者涉及城市（镇）化、社会阶层变化、社会流动性变化、家庭结构变化等，后者主要涉及中国体验、社会心态、群体心理、组织心理等。和心理学取向的研究相比，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具有这些特点：倾向于采用本位概念、质性研究方法，特别关注中观群体心理，关注政治和政策影响，更具历史宏观视野等，这些都是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期待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有更多的合作，共同促进对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

关键词 **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现代化，社会心理学，文化变迁**

中国社会转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

——孙立平，2007

研究现实的社会心理及其嬗变应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

——周晓虹，1994

社会心理学自从学科草创以来，便有两个大的分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 SSP）和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 PSP）。前者以欧洲的社会学家为代表，关心的是“团体生活”，后者以美国的心理学家为代表，关心的是社会情境中的个人（周晓虹，2014a）。由于学科传统、学术思想、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两种不同视角的社会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很多时候保持相

[1] 收稿日期：2021-02-08
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与心理变化”(17ZDA324)的阶段性成果。
通信作者：蔡华俭, E-mail: caihj@psych.ac.cn

对独立的状态，尽管近年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二者相互学习和结合的重要性（Oishi et al., 2009; Chirkov, 2020a, 2020b）。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同样呈现出这两种不同的取向，以致存在两个社会心理学的学术组织：以社会学取向为重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和以心理学取向为重的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尽管两种不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多年来学者们都在关注一个共同的重要话题：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对此，社会学领域通常称之为社会转型研究，而心理学领域通常称之为社会变迁研究。

我们此前已经对心理学视野下的社会变迁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蔡华俭等，2020；黄梓航等，2018）。本文的首要目的则是，对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转型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以便我们能够对这些研究的脉络有一个相对全面、清晰的把握。同时，作为心理学研究者，我们还希望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心理学研究者如何能够从社会学家的工作中获得启示（Greenwood, 2014; Oishi et al., 2009）。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才有利于学科的共同发展。

由于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数量非常庞大，我们只能选择关注和心理变化相关的部分，对于大量不直接涉及心理因素的研究，例如政企关系（如李汉林，魏钦恭，2014）、政策研究（如谢伏瞻，2019）、国际关系（如唐世平，2019）等，它们虽然也属于广义上的社会转型研究，但不包含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具体地，我们关注的社会转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涉及社会或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另一类涉及社会转型导致的人的变化。这两类研究分别对应着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变迁研究的自变量（或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在具体介绍两类的社会转型研究之前，我们先对“社会转型”这一重要学术概念进行介绍。

1. 社会转型及其含义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有过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转型，第二次是由近代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化转型（周晓虹，2014a）。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于 17 世纪的英国（杜艳华，2009），至今已经持续了两三百年，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转型和变革（俞国良，2017；郑杭生，2009）。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跨越学科的概念。社会学家对现代化的集中讨论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如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等著名社会学家都有相关论述（胡鸣铎，牟永

[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学与心理学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学术取向，而不是学者的学科背景或学科认同。

福，2008），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发展社会学这一社会学分支的诞生（文军，王谦，2017）。早期，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将现代化理解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包含世俗化、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理性化等一系列方面（林聚任，2008），并认为世界各地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经历和西方类似的发展轨迹。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尤其是东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经济体的长足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并不存在一种单一形式的现代化，不同国家因为其历史、宗教、地理等因素的不同，其现代化的路径与结果可以非常不同。换言之，现代化与西方化不能划等号，现代化的终点并不是欧美社会，更没有唯一的现代性（Modernity）。因此，学者们提出了多元现代性（Modernities）的概念（相关综述见 Eisenstadt, 2000; Tu, 2000；关于现代化的更多讨论见陈嘉明，2006；林聚任，2008；刘小枫，2018；Fourie, 2012; Giddens, 1991; Lee, 2013）。

现代化使中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变迁（孙立平，2005）。我国社会转型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遵循了西方现代性研究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的历史脉络，其中包括两个重要的学术途径：偏历史学的和偏社会学的。前者关心的是 1949 年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关注"传统—现代"的关系，并先后提出了冲击—反应理论，传统—现代理论、帝国主义理论、中国中心论等（周晓虹，2010），后者关心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尤其关注"国家—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了包括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妥协理论、渗透理论、改造理论等（赵文词，1999）。近些年来，学者们意识到这两对概念是可以共存的，因而不再将传统和现代、国家和社会视作是相互排斥的。

社会学家通过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社会转型具有几大显著特点，包括：1) 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和复杂性，其中二元性是指社会的优化、进步和协调的同时伴随着弊病、代价和失衡，复杂性则是指每个方面的变化在我国的具体社会环境下都显得尤为盘根错节（刘平，2007；郑杭生，2008）；2)意识形态具有连续性，具体情境下又有变通性，即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很多政策在实行中也能够根据具体情境而变通（郑杭生，2009）；3)社会改革通常是渐进式的，即很多转型或制度改进是逐步进行的（马德普，2005）；4)政府具有绝对权威性，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背景下，能够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调控（周晓虹，2014b）。这些特点，再加上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缘因素，使得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明显区别于欧美国家的社会转型。

2. 社会或社会结构的变化

现代化在中国带来的社会转型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社会学和心理学共同关注

的变化有城市（镇）化、社会阶层、家庭结构等。在社会学中，这些变化通常是作为社会转型的直接后果或表现来加以研究的，而在心理学中，则多是作为导致心理和行为变化的前因变量或宏观心理指标。例如，在心理学研究中，城市（镇）化（Urbanization）经常被视作导致心理和行为变化的核心原因之一（Greenfield, 2009），而离婚与结婚率之比则常常直接作为个体主义的宏观指标（Grossmann & Varnum, 2015）。

2.1 城市化和城镇化

在我国社会学领域中，英文 Urbanization 一词对应着城市化和城镇化两个中文概念（田雪原，2013），不同研究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有所区别（王渝陵，2004）。总体而言，前者强调大城市和城市群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后者更看重中小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俞宪忠，2004）。和欧美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中国的城市（镇）化具有几个特点：1)县城和建制镇对于农村人口有明显的吸纳作用；2)政府常常在城市（镇）化进程中发挥自上而下的主导和规划作用；3)城市（镇）化过程有明显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如建立开发区、贫困人口搬迁等）；4)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等中国特色制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5)政策上更倾向于发展中小城市，同时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李强等，2012）。过去几十年来，城市（镇）化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1)城市（镇）化加剧了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2)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3)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何燕，周靖祥，2013；吴奇，邵长斌，2015）。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蔡继明等，2017），"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政策应运而生。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关注我国城镇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和城乡一体化（张荣天，焦华富，2016）。

2.2 社会阶层的变化

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李培林，1992）。陆学艺（2003，2010）认为，改革开放之前（1978 年前），我国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已经出现了十个阶层，分别为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此外，学者还指出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变化的许多特点。孙立平（2003）认为，由于社会资源越来越向少数群体积聚，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差距持续加大，底层社会规模扩增，两者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使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李强（2008）认为，在 2005 年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处在不断的解体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其后，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趋势，并表现出诸多特点：1)相对于政治分层，经济分层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区分社会地位的指标越来越

偏向非身份化（如文凭）；3)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4)相比边缘群体（如农民、工人），中心群体（如政府干部、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获益更大；5)出现了以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为代表的新阶层。与上述看法不同，李路路（2003）认为我国阶层变化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双重再生产”，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除了阶层结构本身的变化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及其变化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迄今，研究者已经揭示了我国的阶层流动性变化的一系列特点：1)阶层流动性一度增加（Bian, 2002），尤其体现在阶层多样性的增加，中产阶层正在崛起（李培林，崔岩，2020；陆学艺，2010）；2)纵向代际传递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富二代”、“官二代”群体的出现，邓志强，2013；周怡，2009），跨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李路路，朱斌，2015）；3)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在下降（范力，丁宁，2010；杨文伟，2014），中低社会阶层内部的向上流动性持续较高（边燕杰，李颖晖，2014；张翼，2011）；4)教育作为一种增强阶层流动性机制的功能正在逐渐降低，尤其表现在不同阶层对教育资源的可得性不同，从教育中的获益也有所差异（黄四林等，2014；罗楚亮，刘晓霞，2018；杨江华，程诚，边燕杰，2014）；5)收入不平等阻碍了流动性的上升（刁鹏飞，2012；陈云松，范晓光，2016）。这些研究共同反映出，社会阶层流动性在改革开放初期较高，但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降低，社会阶层正由急剧转型变为趋于稳态（周怡，2019）。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多样性一度提高，但随后又降低，阶层的流动性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变化。阶层边界和内部认同逐渐形成，社会阶层本身的再生产在增加。这些特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社会阶层正在日益固化（李路路，2008；孙立平，2009）。

2.3 家庭结构的变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过程中，家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传统文化有着严格的家庭结构规范，比如：“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家庭结构特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表现出一些突出特点：1)家庭结构有明显的小型化、老龄化、多元化趋势（彭希哲，胡湛，2015；王跃生，2006，2013；周福林，2014；周占杰，方奕，2016）；2)传统的“父权大家庭”结构依然有吸引力，但维系更加艰难（金一虹，2010）；3)亲属关系虽然依然重要，但其支配性逐渐降低（唐灿，陈午晴，2012）；3)基于经济能力而非血缘伦常的代际关系模式日益盛行，代际关系日益平等（曹慧中，2011；周晓虹，2000）；4)孝道虽然依然流行（刘爱玉，杨善华，2000），但是内涵在发生变化，核

心内容正在由赡养父母变为实现父母的期望（曹慧中，2011；费孝通，1985）；5)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均呈下降趋势（侯佳伟等，2014；吴莹等，2016），生育率多年来持续走低（计迎春，郑真真，2018），男女单性别偏好在不断减弱（侯佳伟等，2018）；6)国家层面的政策（如计划生育和单独二孩、土地公有制、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显著影响（王天夫等，2015；游五岳，姚洋，2020）；7)两性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并未同等地体现在社会实践中（刘爱玉，2020；许琪，2016；杨菊华等，2014）；9)离婚率持续增高，单亲家庭大量出现（苏理云等，2015；徐安琪，叶文振，2002）。

对于这些变化，学者指出，家庭模式在社会转型中虽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但两者并不必然矛盾：一方面，传统性可以在现代性情境下被重新解释（沈奕斐，2010）；另一方面，家庭的核心观念（如和谐团结、敬老爱幼等“家本位”传统）依然广为接受（徐安琪，2013；杨菊华，何炤华，2014）。在影响家庭变迁的因素中，个体的意志和观念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从而使得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趋势日益明显（马春华等，2011）。

3. 人的变化

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心理变化是也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社会学家的笔下，这些心理变化很多被涵盖在“中国体验”和“社会心态”这两个概念中。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研究被涵盖在群体心理、组织心理的范畴下。虽然这些概念在内容上有很多重叠，但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持现有研究原貌，我们对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分别进行介绍。

3.1 中国体验

“中国体验”主要由社会学家周晓虹提出，与“中国经验”相对，用以描述社会转型给中国人带来的心理体验，内容上主要指中国人在宏观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微观变化。周晓虹认为，“中国体验”具有这些特点：1)同时包括积极（如开放、包容、进取）和消极（如拜金、仇富、冷漠）的心理体验；2)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人口、社会结构等因素，具有独特性；3)由于从传统到现代是国家发展的普遍方向，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普适性。在《中国体验》一书中，周晓虹等（2017）对中国人的心理或中国体验的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在幸福感方面，人们的幸福感来源越来越依附于具体物质，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和对享受物质生活的推崇逐渐替代了建国初期的革命理想主义（即“苦中作乐”）精神。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内，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人的幸福感出现了显著的降低（Brockmann et al., 2009），这或许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平等地给所有人群带来利益，反而让多数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有关。

在消费心理方面，随着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人们购买物品的动机不再仅仅是为了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同时也是为了其符号价值（例如，在购买物品时追求“名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渴望在日常的生活方式中符合世界潮流，而非保持当地传统。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们在消费方面既保持着传统社会的储蓄意愿，又愿意接受享乐主义的生活实践（唐兵，2010；赵吉林，2009）。

在信任水平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正在降低，而曾经作为信任准绳的亲疏远近关系正在让位给单纯的利益关系，按照学者的说法，这是从关系本位的“亲而信”向利益本位的“利相关”的转向（景怀斌等，2019）。另一方面，虽然人际信任降低，但多项调查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卢海阳等，2016；钟杨，王奎明，2015）。

在代际关系方面，亲代的付出增加，而子代的义务和责任则有弱化的趋势（王跃生，2011）。家长辈的权威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降低（陈皆明，2010），与子女的关系变得相对平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孝”的内涵从对父母百依百顺变为在不影响子女人格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对父母的尊重。此外，文化反哺，即子代对亲代的反向社会化过程，也促成了代际关系的平等化（周晓虹，2015）。

在信息传递方面，大众传媒的出现培育了大众的现代性，新媒体的出现则进一步消解了中央政府在话语权中传统的垄断性。尤其是网络通讯、手机通讯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大众有了一个发声渠道，能够通过民间言论形成舆论监督、政治参与的功能。另一方面，网络的出现也增加了人们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姬广绪，周大鸣，2017；田丽，贾哲敏，2011；杨东，吴晓蓉，2002；Kraut et al., 1998）。

在情爱和性方面，人们变得更为自主了。在择偶时，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的重要性降低，个人教育、职业、收入等因素的重要性大为提高（Davis, 2014; Wang & Nehring, 2014）。在婚姻中，外部的社会控制在减弱，个体的自主性大为增强，人们也越来越认可夫妻情感在维系婚姻中的重要性（张帆，钟年，2017；潘绥铭，侯荣庭，2013）。在性方面，诸如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等话题变得不再那么敏感，人们对性相关的话题变得更为包容和理解（黄盈盈，潘绥铭，2016; Lin et al., 2016; Yeung & Hu, 2016）。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尤其表现为从伦理和政治取向到经济取向的转变，文化上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经济上从道义到利益的转变，政治上从威权到法制、从民享到民主等的转变。同时，诸如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因素加剧了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焦虑症候（周晓虹，2014c），出现了诸多消极社会心态（夏学銮，2011）

或“忧伤维度”（方文，2008）。对于未来，周晓虹（2014a）指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提高，社会心态的开放多元、积极主动，世界意识的觉醒将是未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发展方向。

3.2 社会心态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学术与大众讨论中（景怀斌，1989；刘东超，2004）。作为一个术语，社会心态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史亚丽，柳礼泉，2015）。在社会心理学中，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个概念的定义也有不同的侧重（刘力，2006；马广海，2008；杨宜音，2006）。王俊秀（2013）将社会心态定义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并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在一定的文化和亚文化下社会中多数成员或较大比例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构成一种氛围，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这一概念虽表面上与心理学中的价值观相似，但与强调稳定性的价值观概念相比，社会心态既强调稳定性，更强调动态性，关注的更多是群体层面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过程，内涵更为广泛、丰富（王俊秀，2014）。

根据社会心态的稳定性和动态性，学者认为可以将社会心态按照变化快慢和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分为变动性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稳定性社会心态和超稳定性社会心态。越是稳定的结构，变化的速度就越慢，而超稳定性社会心态可以视作国民性或民族性（王俊秀，2013）。

关于社会心态的内容结构和操作测量，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俊秀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包括社会需要（包含社会和个体需要）、社会认知（包含社会思维、群体与关系认知、态度与评价）、社会情绪（包括基本情绪、符合情绪、情绪氛围）、社会价值（包括个体和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包括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王俊秀，2013，2014）。基于此，王俊秀等构建了社会心态指数体系，并定期开展全国性的社会心态调查。至今，研究者已经发布了系列《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王俊秀，2020）。

还有研究者从其他方面对社会心态进行操作化和测量，并开展研究。俞国良和王浩（2017）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指出，发展经济、依法治国、提升安全感是全体国民的普遍期待。孙德梅等（2014）通过分析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新一批数据，发现我国民众对于我国现存的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普遍持负面态度。林聚任等（2015）通过比较 2003 年和 2013 年 CGSS 的数据，发现我国居民的社会心态出现了较大分化，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从失业温饱转向贫富差距。陈彬等（2019）分析了 CGSS2015 年的数据，发现了公众社

会参与和社会心态之间的正向关系。高文珺等（2013）通过在线调查，发现我国居民总体社会心态良好，但在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安全等方面没有得到全面的满足。一些研究者将上面的现象，即社会转型中的负面社会心态，称为社会心理的失衡（范和生，唐慧敏，2015；侯晋雄，2006；林伟龙，2018；童正容，翟玮玮，2008）。总体来看，目前对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发现，我国国民的社会心态在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上水平不高，反映在人们的普遍信任水平较低和感受到的社会公平的缺失（李路路，王鹏，2018）、道德观念的滑坡（孙立平，2001；郁乐，2014）、幸福感水平的震荡（俞国良，2016；王俊秀，刘晓柳，2019）。周晓虹（2009，2011）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先后经历了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产生、顿挫、复苏和发展几个阶段（也见谢天，俞国良，2016）；现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体现出显著的二元性特征，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农村、东方和西方、积极和消极"这一系列概念的冲突与平衡。

3.3 群体心理

社会群体通常指的是拥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个体的集合，如留守儿童群体、孕妇群体、下岗群体等（方文，2008）。社会转型中的特定群体心理和行为变化是社会学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一个主题（如罗峰，文军，2014；沈原，2006）。龙书芹（2010）通过分析 CGSS 的数据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对于诸如事业成功、社会信任的信念差异明显。例如，在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方面，企业家群体重视先赋因素（比如家庭条件）胜于自致因素（比如进取心），而农民、工人群体则相反。工人群体同时还表现出对官方渠道信息的不信任，以及对社会冲突的明显感知（也见龙书芹，风笑天，2015）；刘军强等（2012）分析了 CGSS 的数据，发现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国民幸福感在 2003 年到 2010 年间都有所上升；吴愈晓（2013）的研究发现，在受教育方面，城乡群体的不平等正随年代扩大，这首先表现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显著作用，其次表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逐渐扩大的城乡差异。总体来说，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底层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低保户、"漂族"）在社会转型中感受到了更强的相对剥夺感（俞国良，王浩，201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外来人口群体的系列研究（陈进华，2017；李晓梅，2012；江立华，2018；颜廷平，2011）。研究者们发现，对于新晋城市人口，城市（镇）化带来的结果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相关综述见梁波，王海英，2010；潘泽泉，2011）。例如，陈云松和张翼（2015）通过分析中国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发现对于进城农民而言，其农村户籍与诸如身份认同、文化行为等融入指标呈负相关关系。王春光（2001）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群体对于自身"城里人"和"农民"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矛盾。杨菊华

（2015）的研究同样发现，受制于社会制度（如户口）和社会结构（如社区环境），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不高。换言之，相比城里人而言，这些研究发现，进城农民从城市（镇）化过程中获益的程度更低，对自身“城里人”身份的认同也更低。一系列研究分析了其中可能的原因，发现了影响外来人口群体融入城市（镇）化进程的诸多因素，比如：1)能否在社区中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蔡禾，曹志刚，2009）；2)能否从城市（镇）化中实际获益（如收入、教育等，王华，彭华，2009）；3)政治制度（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市场制度（如市场劳动力需求）会不会对个体的城市（镇）化进程造成阻碍（李强，2003；张国胜，2007）；4)能否对自己的新身份形成足够的心理认同感（栗志强，2006）。周晓虹（1998）发现，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能使个人“脱离土地的束缚”，使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但是，由于条件限制，进城农民工的现代化通常是一种“不完全的现代化”。

3.4 组织心理

中观层面的企业组织相关的变化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领域。总体上，社会转型研究尤其涉及其中的两个方面：企业组织的领导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企业组织的领导管理模式 在快速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学的研究发现，我国的领导模式有着从“家长式”到“兄长式”，从“宝塔式”到“扁平化”的变化趋势。上世纪 80 年代起，有学者通过个案调查和访谈研究，提出我国企业的独特领导模式：家长式，即“在一种人治的氛围下，显现出严明的纪律及权威、父亲般的仁慈及道德的廉洁性的领导方式”（相关综述见杨朦晰等，2019；张晓军等，2017；郑伯埙，黄敏萍，2019），并将其提炼为包含了权威、仁慈和德行的三元理论框架（樊景立，郑伯埙，2000；张振刚等，2013；郑伯埙等，2000）。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变，支撑家长制领导模式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相关综述见孙秀丽等，2020），中国企业的领导模式正逐渐变为“注重在平等的交流过程中，依靠愿景来激发组织成员的共鸣，凭借出色的才干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令下属心悦诚服”的“兄长式”领导模式（杨斌，丁大巍，2012）。类似的，有学者提出，随着体制转型，我国的企业领导模式有着从“集权式领导”到“人缘式领导”，再到“人心式领导”的类型转换（沈毅，2012）。对于管理模式，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企业管理正从传统的强调企业结构的“宝塔式管理”变为下放权力和责任的“扁平化管理”（曹丽娟，2001）。扁平化管理模式之所以能够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算机信息化技术的成熟和高素质员工的增加，这些都是和社会转型本身分不开的（朱伟民，2009）。从宝塔式管理到扁平化管理，员工与企业

组织的关系变得更为宽松而灵活，与领导的关系越来越强调协调和互动，而员工之间则越来越重视团结和合作（赵泽洪，朱亚兰，2013）。

企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关系（Guanxi）是一个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相关综述见 Chang, 2011; Chen et al., 2013; Zhang & Pimpa, 2010）。它不同于英文中的 Connection 或者 Relation（翟学伟，1993），在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uo et al., 2011）。一系列研究关注了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关系作用的变化（边燕杰，缪晓雷，2020；Bian, 2018）。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关系作用，市场转型论认为，它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式微；权力维续论则认为，社会网络关系的作用不会消退，反而会因为政治资本重要性的增加而加强。Bian（2013, 2017）认为，关系作为一种知识和网络，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其重要性将随着市场竞争和体制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升高。在实证研究中，Bian 和 Zhang（2014）分析了数次全国性调查中的数据并发现，在求职过程中，信息关系资源（获取求职相关信息的途径）和人情关系资源（通过人情获得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边燕杰和缪晓雷（2020）对这种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认为，随着市场体制趋于稳定，人情关系资源的重要性将不会继续上升，但信息关系资源会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而显得愈发重要。

4. 社会转型研究：小结、特点及启示

4.1 小结

本文中，我们对社会转型研究中和心理学相关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其中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中国社会或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镇）化速度加快，但同时带来了诸多问题；社会分层增加，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图景；阶层间的流动性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近年来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在降低，阶层固化趋势明显；家庭结构小型化、老龄化、多元化趋势明显，代际关系变得更平等，生育意愿下降，传统家庭模式式微，单亲家庭增多。另一个方面的研究则探讨了转型过程中人的心理的变化，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体验”、“社会心态”、群体心理、组织心理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价值观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经历了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现代价值观的产生、顿挫、复苏和发展几个阶段；幸福感越来越倚重物质，幸福感水平在 90 年代到新世纪初出现显著降低；消费上日益注重品牌，物质主义水平上升，追求享乐；信任从关系本位向利益本位转向，整体水平下降；代际关系方面，长辈付出增加，但权威下降，子代义务和责任降低，文化反哺现象增多，代际之间日益平等；人际交往和交流方式越来越倚重网络，孤独感和疏离感增强；两性情爱自主性增强，性观念和态度更为开放和包容；负面社

会心态上升，社会心理失衡加剧；不同群体心态差异加大，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增强；农民工身份认同矛盾上升，表现出“不完整现代化”的特征；领导和管理模式经历了从“家长式”到“兄长式”、从“宝塔式”到“扁平化”的转变；作为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关系网络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降反升。这些变化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相对短暂的，又有相对长期的；既有线性的，也有非线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上初步勾画出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变化图景，即：现代社会盛行的个体主义上升，而许多传统价值在式微；但是，部分传统价值在延续甚至加强（比如，关系的重要性）。总体上，当下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将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东方与西方不断碰撞和交融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4.2 特点及启示

我们此前对心理学视野下的变迁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蔡华俭等，2020；黄梓航等，2018）。和心理学中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相比，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转型研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心理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在概念上，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描述人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的许多概念都是来自语言和生活实践，带有非常强的本位（Emic）色彩，更接近中国社会生活现实和日常语言习惯，比如：“中国体验”、“社会心态”，这使得社会学的许多成果更容易被接受并得到传播（周晓虹，2017；王俊秀，2020）。心理学的社会变迁研究通常是以源自西方的，心理学领域已经广泛确证的心理过程、特点以及相应的构念为基础，比如文化价值、自我、认知、情绪、动机、心理健康、社会态度等等（蔡华俭等，2020），继而以此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进行描述和研究，因此带有强烈的客位（Etic）特色。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本位和客位之争（梁玉成，2018；杨慧芳等，2007；谢宇，2018；翟学伟，2018；周晓虹，2020; Cheung & Rensvold, 2000）。虽然使用外来、基于现代心理学的概念看起来相对科学，涵义和操作更加明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对中国人进行描述和研究时，这些概念常常会有削足适履、隔靴搔痒之嫌，更无法捕捉一些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心理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未来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心理学家要多向社会学家学习，从本位视角出发，更多关注研究有本土特色的现象，比如孝顺、面子、人情等（杨国枢等，2005），特别要善于从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中吸取灵感，弥补心理学研究的不足。比如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2015），就非常值得心理学家去研究。

第二，在方法上，社会学特别倚重质性研究，大量采用社会观察、个案（或案例）研究、深度访谈、焦点团体等方法，然后通过分析思辨，对现象进行概念提炼和理论阐释

（如阎云翔，2016）。与此相对，心理学则几乎完全依赖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统计分析去推测可能的规律。一味依赖定量方法和统计推断，使得心理学的很多研究及其结果难免琐细和零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外，很多心理特征在定量过程中被过度分解，不仅失去了很多信息，甚至被不当地操作化定义，以致出现很多不一致的发现。鉴于此，未来的心理学视野的变迁研究可以适当借鉴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研究的前期，可以通过社会观察、访谈、个案分析等质性研究，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概念内涵，采用更合适的方式进行测量，并形成更切合实际的研究假设。此外，社会学注重思辨和理论的特点也值得借鉴。中国的社会学家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理论，比如中国中心论（周晓虹，2010）和改造理论等（赵文词，1999）。当下，中国心理学特别需要对大量零散的发现进行理论整合和提升。

第三，在分析层面上，在研究文化变迁时，心理学研究的着眼点通常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于中观层面的研究，如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十分鲜见。相对而言，社会学中，相当部分的研究以中观层面的群体作为分析的单位，通过研究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变迁，展现了心理学研究中少见的图景（Serpa & Ferreira, 2019），例如社会学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反观心理学，对于中观层面的组织、社区、特定人群的心理变化，则很少有研究。这是未来心理学视角的社会变迁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

第四，在探讨社会转型的脉络和原因时，社会学往往展现出更为宏大的视野，更能把中国的社会转型放在更为广阔的中国，甚至世界历史洪流中进行审视，同时更多关注政治和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心理学视野的变迁研究虽然也关注了非常广泛的因素，包括生物基因、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经济等，但是很少考虑历史、政治（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和政策方面的因素。考虑到中国的当代变迁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和文化变迁历程的一部分，更是世界文明演进的一部分，并且，政府主导的由上至下的政策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比如：计划生育、改革开放等），这种不足就显得尤为突出。无疑，未来心理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研究需要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更多考虑国际、国内政治以及各个时期国家各种政策的影响，从而更好、更全面地揭示导致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人的心理变化的历史规律及其背后原因。

5. 结语

自英国工业化和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开启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转型后的第二次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大转型。作为世界现代化大转型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过去半

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千年未有的大变化。而当下，世界又处于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探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规律和其中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是诸多学科共同的历史使命。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由于其特殊的学科性质，更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心理学从诞生之初就有着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本文对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转型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和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相比，社会学的研究更具有本位特色、更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更多关注中观层面变化、更具有历史视野、更关注政治和政策的作用，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人心理变化的许多新的特点。社会学研究的这些特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优点，是心理学家在未来社会变迁研究中特别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如当下国际学界所呼吁（Chirkov, 2020b; Gergen, 2012; Oishi et al., 2009），期待两种不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未来能够取长补短、互相合作；两种不同取向的学者能够拥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更为广阔多元的视野，始终不忘："研究现实的社会心理及其嬗变应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周晓虹，1994），共同把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及其嬗变的研究推向下一阶段：一个兼顾本位和客位，考察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面，考虑生物、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各种因素，采取定性和定量方法，包含还原分析、理论思辨与整合提升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边燕杰, & 李颖晖. (2014). 体制转型与户籍身份转化: “农转非”微观影响机制的时代变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4), 124–134.

边燕杰, & 缪晓雷. (2020). 如何解释关系作用的上升趋势?. *社会学评论*, *8*(1), 1–19.

蔡禾, & 曹志刚. (2009).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9*(1), 148–158.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谢怡萍, 杨盈, 杨紫嫣, 敬一鸣. (2020).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8*(10), 1599–1618.

蔡继明, 高宏, & 刘媛. (2017). 城市化路径选择: 大城市优先还是小城镇优先. *河北学刊, 37*(6), 140–146.

曹慧中. (2011). 传承抑或断裂: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与代际关系演变——以 1994 年保定家庭调查为例. *中国研究*, *(2011, 11 月)*, 204–216.

曹丽娟. (2001). 组织架构: 由宝塔式转向扁平化. *经济论坛, (2001, 11 月)*, 31–32.

陈彬, 张仁鹏, & 陈济生. (2019). 社会参与, 自评健康评价与社会心态关系研究——基于 CGSS2015 数据.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0*(5), 78–84.

陈皆明. (2010). 中国养老模式: 传统文化, 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0*(6), 44–50.

陈嘉明. (2006).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进华. (2017). 中国城市风险化: 空间与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8 月)*, 43–60.

陈云松, & 范晓光. (2016). 阶层自我定位, 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12 月)*, 109–126.

陈云松, & 张翼. (2015). 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6 月)*, 78–95.

邓志强. (2013). 青年阶层固化研究——青年的阶层固化:“二代们” 的社会流动. *中国青年研究, (2013, 6 月)*, 4–10.

刁鹏飞. (2012). 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 *江苏社会科学, (2012, 8 月)*, 107–113.

杜艳华. (2009).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现代化起源的科学论证.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39*(2), 20–27.

樊景立, & 郑伯埙. (2000). 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 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 *本土心理学研究*, *13*(1), 127–180.

范和生, & 唐惠敏. (2015). 论转型期中国社会心理的重构.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6*(1), 66–73.

范力, & 丁宁. (2010). 中国居民个人收入流动性——计量分析. *中国软科学, (2010, 6 月)*, 177–185.

方文. (2008). 转型心理学: 以群体资格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4 月)*, 137–147.

费孝通. (1985).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高文珺, 杨宜音, 赵志裕, 王俊秀, & 王兵. (2013). 几种重要需求的满足状况: 基于网络调查数据的社会心态分析. *民主与科学, (2013, 8 月)*, 73–76.

何燕, & 周靖祥. (2013).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辩: 构建区域联动发展研究新框架.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4), 1–12.

侯佳伟, 顾宝昌, & 张银锋. (2018). 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 1979-2017.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0 月)*, 86–101.

侯佳伟, 黄四林, 辛自强, 孙铃, 张红川, & 窦东徽. (2014).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 1980——2011.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4 月)*, 78–97.

侯晋雄. (2006). 转型期社会心态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4*(4), 24–27.

胡鸣铎, & 牟永福. (2008). 从马克思, 韦伯到哈贝马斯: 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1*(6), 65–69.

黄四林, 辛自强, & 侯佳伟. (2014). 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及其趋势——基于北京某重点大学 2007—2012 年的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 (2014, 3 月)*, 46–52.

黄盈盈, & 潘绥铭. (2016). 中国人的性技巧之变——21 世纪全国 18~61 岁总人口四次随机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 *中国性科学, 25*(11), 150–154.

黄梓航, 敬一鸣, 喻丰, 古若雷, 周欣悦, 张建新, 蔡华俭. (2018). 个人主义上升, 集体主义式微?——全球文化变迁与民众心理变化. *心理科学进展*, *26*(11), 2068–2080.

姬广绪, & 周大鸣. (2017). 从“社会”到“群”: 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 *思想战线*, *43*(2), 53–60.

计迎春, & 郑真真. (2018). 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8 月)*, 143–161.

江立华. (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人口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社会发展研究, (2018, 5 月)*, 22–40.

金一虹. (2010). 流动的父权: 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4 月)*, 151–165.

景怀斌. (1989). 从依赖集体主义到关系自私主义——十年来中国社会心态变异探析. *社会科学家, (1989, 10 月)*, 65–68.

景怀斌, 丁太平, & 傅承哲. (2019). 中国民众现代理念 20 年变迁及其世代与年龄效应. *青年探索, (2019, 5 月)*, 38–53.

李汉林, & 魏钦恭. (2014). *嵌入过程中的主体与结构：对政企关系变迁的社会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路路, & 王鹏. (2018). 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3 月)*, 83–101.

李路路, & 朱斌. (2015). 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5 月)*, 40–58.

李路路. (2003). *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路路. (2008). 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 *社会, 28*(3), 24–30.

李培林. (1992).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 (1992, 5 月)*, 3–17.

李培林, & 崔岩. (2020). 我国 2008—2019 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江苏社会科学, (2020, 4 月)*, 51–60.

李强. (2003).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5 月)*, 125–136.

李强. (2008).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北京社会科学, (2008, 5 月)*, 47–60.

李强, 陈宇琳, & 刘精明. (2012).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7 月)*, 82–100.

李晓梅. (2012). 中国城镇化模式研究综述. *西北人口, 33*(2), 45–48.

栗志强. (2006). 都市村庄流动人口社区认同状况及成因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7*(2), 9–11.

梁波, & 王海英. (2010). 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人口与发展, 16*(4), 73–85.

梁玉成. (2018). 走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误区. *新视野, (2018, 7 月)*, 49–54.

林聚任. (2008). 论多元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文史哲, (2008, 11 月)*, 155–160.

林聚任, 张月阳, & 向维. (2015). 近十年来居民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心态变化趋势与问题——基于 CGSS 有关数据的分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31*(3), 6–19.

林伟龙. (2018).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刘爱玉, & 杨善华. (2000). 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5 月)*, 59–70.

刘爱玉. (2020). 转型中国的大样本调查及核心议题.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0, 1 月), 1–16.

刘东超. (2004). 当代中国文化变迁和社会心态演变. *学术探索, (2004, 3 月)*, 102–105.

刘军强, 熊谋林, & 苏阳. (2012).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12 月)*, 82–102.

刘力. (2006). 社会形态与社会心态——评杨宜音的《个体与宏观社会建构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社会心理研究. 1*, 12–17.

陆学艺. (2003).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 *江苏社会科学*, (2003, 7 月), 1–9.

陆学艺. (2010).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60 年.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6 月)*, 1–12.

刘平. (2007). 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1 月)*, 104–117.

刘小枫. (2018).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龙书芹, & 风笑天. (2015). 社会结构, 参照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 *青年研究, (2015, 1 月)*, 39–46.

龙书芹. (2010). 转型期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及其阶层差异性—基于 2006CGSS 的实证分析.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0, 11 月)*, 32–37.

卢海阳, 郑逸芳, & 黄靖洋. (2016). 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 16 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 (2016, 8 月)*, 92–99.

罗楚亮, & 刘晓霞. (2018). 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2 月)*, 121–140.

罗峰, & 文军. (2014). 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群体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2014, 3 月), 101–107.

马春华, 石金群, 李银河, 王震宇, & 唐灿. (2011).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 *社会学研究, 25*(2), 182–216.

马德普. (2005). 渐进性, 自主性与强政府——分析中国改革模式的政治视角.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 10 月)*, 19–23.

马广海. (2008). 论社会心态: 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 *社会科学, (2008, 10 月)*, 66–73.

潘绥铭, & 侯荣庭. (2013). 弥散与炫彩: 后革命的性化时代. *社会学评论, 1*(5), 12–21.

潘泽泉. (2011). 被压抑的现代性: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3*(1), 57–63.

彭希哲, & 胡湛. (2015).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12 月)*, 113–132.

沈奕斐. (2010). *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上海.

沈毅. (2012).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本土组织领导模式变迁——以某国有改制企业的组织“关系”实践为例. *管理世界, (2012, 12 月)*, 132–154.

沈原. (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社会学研究*, *(2006, 3 月)*, 13–36.

史亚丽, & 柳礼泉. (2015). 近年来国内社会心态研究述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36*(9), 211–215.

苏理云, 柳洋, & 彭相武. (2015). 中国各省离婚率的空间聚集及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人口研究*, *39*(6), 74–84.

孙德梅, 王正沛, & 康伟. (2014). 转型期我国公民社会心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CGSS2008 调查数据的分析. *科学决策, (2014, 1 月)*, 1–14.

孙立平. (2001). "道德滑坡"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1, 9 月)*, 65–69.

孙立平. (2003). *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立平. (2005).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孙立平. (2007). 转型社会学: 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问题. 见高翔 (编).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 (pp. 403–42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立平. (2009).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南京社会科学, (2009, 5 月)*, 93–97.

孙秀丽, 王辉, & 赵曙明. (2020). 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国领导学研究路径评述. *管理学报*, *17*, 1254–1264.

唐兵. (2010). *建国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

唐灿, & 陈午晴. (2012). 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 *江苏社会科学, (2012, 4 月)*, 92–103.

唐世平. (2019). 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3 月)*, 187–203.

田丽, & 贾哲敏. (2011). 互联网使用与孤独感关系探析. *图书情报工作*, *55*(6), 6–10.

田雪原. (2013). 城镇化还是城市化. *人口学刊*, *35*(6), 5–10.

童正容, & 翟玮玮. (2008). 论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失衡与和谐社会心理构建. *经济与社会发展*, *6*(6), 85–88.

王春光. (2001).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 *3*(1), 63–76.

王华, & 彭华. (2009). 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模型——对广州的实证研究. *地理科学*, *29*(1), 50–55.

王俊秀. (2013). 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 *社会科学战线, (2013, 2 月)*, 167–173.

王俊秀. (2014). 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学研究, 29*(1), 104–124.

王俊秀. (2020). *中国社会心态十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俊秀, & 刘晓柳. (2019). 现状, 变化和相互关系: 安全感, 获得感与幸福感及其提升路径. *江苏社会科学, (2019, 1 月)*, 47–55.

王天夫, 王飞, 唐有财, 王阳阳, & 裴晓梅. (2015). 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2 月)*, 41–60.

王渝陵. (2004). 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中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1*(2), 51–53.

王跃生. (2006).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月)*, 96–108.

王跃生. (201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 变动和趋向. *江淮论坛, (2011, 3 月)*, 122–129.

王跃生. (2013).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2 月)*, 60–77.

文军, & 王谦. (2017). 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 发展研究学科范式的新探索. *江海学刊, (2017, 1 月)*, 96–104.

吴奇, & 邵长斌. (2015). 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综述与评价.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1 月)*, 42–49.

吴莹, 杨宜音, 卫小将, & 陈恩. (2016). 谁来决定“生儿子”?——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 31*(3), 170–192.

吴愈晓. (2013).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 (1978—2008).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3 月)*, 4–21.

夏学銮. (2011). 值得关注的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 *党政干部参考, (2011, 5 月)*, 29–29.

谢伏瞻. (2019). 新中国 70 年经济与经济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10 月)*, 5–22.

谢天, & 俞国良. (2016). 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特征嬗变及其走向. *河北学刊, 36*(3), 166–171.

谢宇. (2018).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社会学研究, 33*(2),1–13.

徐安琪, & 叶文振. (2002). 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 *人口研究, 26*(4), 28–35.

徐安琪. (2013). 家庭价值观变迁: 去传统化? 去集体主义化?. *中国研究, (2013, 11 月)*, 171–199.

许琪. (2016).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 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 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5 月)*, 33–43.

颜廷平. (2011).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理论与当代, (2011, 1 月)*, 12–15.

阎云翔. (2016).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杨斌, & 丁大巍. (2012). "兄长式"而非"家长制": 基于文化视角的当代中国企业领导模式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7*(2), 151–157.

杨东, & 吴晓蓉. (2002). 疏离感研究的进展及理论构建. *心理科学进展, 10*(1), 71–77.

杨国枢, 黄光国, & 杨中芳. (2005). *华人本土心理学*.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杨慧芳, 郭永玉, & 钟年. (2007).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心理学探新, 27*(1), 3–7.

杨江华, 程诚, & 边燕杰. (2014). 教育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1956—2009). *青年研究, (2014, 9 月)*, 1–11.

杨菊华, & 何炤华. (2014).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 *人口研究, 38*(2), 36–51.

杨菊华.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2 月)*, 61–79.

杨菊华, 李红娟, & 朱格. (2014). 近 20 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 *妇女研究论丛, (2014, 11 月)*, 28–36.

杨朦晰, 陈万思, 周卿钰, & 杨百寅. (2019). 中国情境下领导力研究知识图谱与演进: 1949-2018 年题名文献计量. *南开管理评论, 22*(4), 80–94.

杨文伟. (2014). *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博士学位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

杨宜音. (2006).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社会学研究, (2006, 7 月)*, 117–131.

游五岳, & 姚洋. (2020). 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 1950—2000 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4 月)*, 66–89.

郁乐. (2014). 社会转型中的规范缺位与评价错位——关于"道德滑坡论"的理性反思. *伦理学研究, (2014, 3 月)*, 18–22.

俞国良, & 王浩. (2017). 社会转型: 社会心理变迁影响社会舆论引导.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54*(4), 97–103.

俞国良. (2016). 社会转型: 国民幸福感的震荡与变迁.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6, 3 月)*, 80–89.

俞国良. (2017). 社会转型: 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理建设.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4), 433–439.

俞宪忠. (2004). 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一个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发展框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4*(5), 86–90.

翟学伟. (1993). 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 *社会学研究, (1993, 8 月)*, 74–83.

翟学伟. (2018). 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 *探索与争鸣, (2018, 9 月)*, 49–57.

张帆, & 钟年. (2017). 中国人的信任与生命史策略.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3*, 44–61.

张国胜. (2007).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3 月)*, 42–46.

张荣天, & 焦华富. (2016).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综述与展望. *世界地理研究*, *25*(1), 59–66.

张晓军, 韩巍, 席酉民, 葛京, 刘鹏, & 李磊. (2017). 本土领导研究及其路径探讨. *管理科学学报, 20*(11), 36–48.

张翼. (2011).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 CGSS 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 6 月)*, 65–74.

张振刚, 徐洋洋, & 余传鹏. (2013). 家长式领导研究述评与展望.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3, 7 月)*, 22–30.

赵吉林. (2009). *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

赵文词. (1999). 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见 涂肇庆, 林益民 (编).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赵泽洪, & 朱亚兰. (2013). 组织扁平化趋势中员工关系管理的变化与重构——基于自我领导理论的视角. *江淮论坛, (2013, 7 月)*, 71–75.

郑伯埙, & 黄敏萍. (2019). 组织行为研究在台湾五十年：路线、转折及反思. *中华心理学刊, 61*(4), 341–360.

郑伯埙, 周丽芳, & 樊景立. (2000). 家长式领导量表: 三元模式的建构与测量. *本土心理学研究*, *14*(3), 1–54.

郑杭生. (2008). 改革开放 30 年: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 *社会科学研究, (2008, 7 月)*, 1–9.

郑杭生. (2009). 改革开放三十年: 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2 月)*, 10–19.

钟杨, & 王奎明. (2015). 关于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多维度分析. *政治学研究, (2015, 12 月)*, 87–97.

周福林. (2014).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中州学刊, (2014, 9 月)*, 83–86.

周晓虹. (1994). 本土化和全球化: 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 *社会学研究, (1994, 11 月)*, 13–21.

周晓虹. (1998).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 *社会学研究, (1998, 9 月)*, 58–71.

周晓虹. (2000).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 *社会学研究, (2000, 3 月)*, 51–66.

周晓虹. (2009). 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 *河北学刊*, *29*(5), 1–6.

周晓虹. (2010). 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 *社会学研究*, *25*(2), 1–29.

周晓虹. (2011).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天津社会科学, (2011, 11 月)*, 12–19.

周晓虹. (2014a).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1 月)*, 1–10.

周晓虹. (2014b).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 *社会学研究*, *29*(4), 1–23.

周晓虹. (2014c).焦虑：迅疾变迁背景下的时代症候.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1 月)*, 54–57.

周晓虹. (2015).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 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晓虹. (2017). *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晓虹. (2020). 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 *社会学研究*, *35*(1),16–36.

周怡. (2009). 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 *社会学研究*, *24*(6), 206–225.

周怡. (2019). 传统与现代的交叠——分层话语体系下的中国社会形态及其变迁(1978—2018). *社会科学, (2019, 8 月)*, 57–66.

周占杰, & 方奕. (2016). 中国农村婚姻形态的流变. *青年学报*, *18*(1), 60–66.

朱伟民. (2009). 组织扁平化与管理变革. *江苏商论, (2009, 2 月)*, 108–109.

Bian, Y.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1), 91–116.

Bian, Y. (2013).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Saskatoon: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Bian, Y. (2017). The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of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3*(2), 261–267.

Bian, Y. (2018). The prevalence and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The China Quarterly*, *235*(3), 597–621.

Bian, Y., & Zhang, L. (2014).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guanxi culture. In D. J. Brass, G. Labianca, A. Mehra, D. Halgin, and S. P. Borgatti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vol 40,* (pp. 421–443). Bingley, UK: Emerald Books.

Brockmann, H., Delhey, J., Welzel, C., & Yuan, H. (2009).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4), 387–405.

Chang, K. C. (2011). A path to understanding guanxi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Variations on network behavior. *Sociological Theory*, *29*(4), 315–339.

Chen, C. C., Chen, X. P., & Huang, S. (2013). Chinese guanxi: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9*(1), 167–207.

Cheung, G. W., & Rensvold, R. B. (2000). Assessing extreme and acquiescence response se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2), 187–212.

Chirkov, V. (2020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ociocultural model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3*(2), 143–162.

Chirkov, V. (2020b). The sociocultural movement in psychology, the role of theories in sociocultural inquiries, and the theory of sociocultural model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3*(2), 119–134.

Davis, D. S. (2014). 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odern China, 40*(6), 551–577.

Eisenstadt, S. N. (2000).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1), 1–29.

Fourie, E. (2012). A future for the theory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Insights from the new modernization theor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1*(1), 52–69.

Gergen, K. J. (2012).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 historical analysis. In A. W. Kruglanski & W. Stroebe (Eds.),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137 –58).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field, P. M. (2009). Linking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Shifting pathways of hum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2), 401–418.

Greenwood, J. D. (2014). The social in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8*(7), 303–313.

Grossmann, I., & Varnum, M. E. (2015). Social structure, infectious diseases, disasters, secula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merica.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3), 311–324.

Kraut, R., Patterson, M., Lundmark, V., Kiesler, S., Mukophadhyay, T., & Scherlis, W. (1998).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9), 1017–1031.

Lee, R. L. (2013). Modernity, modernities and modernization: Tradition reapprais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2*(3), 409–424.

Lin, K., Button, D. M., Su, M., & Chen, S. (2016).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ing factors.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13*(2), 158–172.

Luo, Y., Huang, Y., & Wang, S. L. (2011).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1), 139–172.

Oishi, S., Kesebir, S., & Snyder, B. H. (2009). Sociology: A lost conne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3*(4), 334–353.

Serpa, S., & Ferreira, C. M. (2019).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of soci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7*(3), 120–124.

Tu, W. (2000).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 *Daedalus, 129*(1), 195–218.

Wang, X., & Nehring, D. (2014). Individualization as an ambition: Mapping the dating landscape in Beijing. *Modern China, 40*(6), 578–604.

Yeung, W. J. J., & Hu, S. (2016). Paradox in marriage values and behavi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3), 447–476.

Zhang, J., & Pimpa, N. (2010). Embracing guanxi: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1), 23–31.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ocietal change: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Psychologists

HUANG Zi-Hang[1], WANG Jun-Xiu[2], SU Zhan[3,4], JING Yi-Ming[3,4], CAI Hua-Jian[3,4]

([1]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3] *Center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have approached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wo perspectives: a sociological one and a psychological one. Although two perspectives have mostly developed in a parallel way, both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into a common area: societal change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impacts. Pa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etal changes has focused on two aspects: changes in society or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people. The former mainly involves urbanization, changes of social class, change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changes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latter mainly involves changes of Chinese experience, social mentality, group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Compared with psychological approach, sociological approach tends to adopt more emic concepts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group psychology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s of politics and policy, and employ more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future studies,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sts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need to learn from and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ultimately achiev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of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Social change; social transformation; modernization; social psychology; cultural change